

溥儀出宮前後

● 溥佳

偷運書畫寶物出宮

我的父親載瀾，是醇親王載灃的胞弟，載灃是溥儀的父親，我和溥儀是親叔伯兄弟。我幼年與溥儀在一起學習英文，經常行走宮內。一九二四年十一月，馮玉祥驅逐溥儀出宮，將溥儀、溥傑和我圈在一起。

現將此中前後經過情況，親身經歷及所見所聞，就回憶所及記述於下。

一九二四年的秋天，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。戰局的演變，很快地又迫近北京。

當時，我們還認為這次戰爭與往昔的內戰沒有什麼不同之處，不管直、奉那一方面取得勝利，對於清室來說，是沒有什麼可以顧慮的，因而仍舊抱著靜待那方面勝利就「歡迎」那一方面的態度。

我們很有自信地認為：凡在民國掌握政權的達官顯宦，大都和清室的王公多少有些舊的關係。就以我的父親載瀾來說，在清朝時代，曾任軍諮大臣和訓練禁衛軍大臣，民國時代也做過鞏威將軍。

因此，在這些軍政大員之中，都有新舊同僚和舊日屬下、師生等等關係。

我父親平素頗喜交往，每當內戰結束更換新的政權時，總是送往迎來酬酢不絕，彼此之間的關係搞得相當不錯。在當時，上至「皇帝」，下至王公，都有恃而無恐地住在「宮廷」、「府邸」之內。

直奉戰爭演到正酣之際，平空傳來了馮玉祥班師回京的消息（當時北京人都稱之為馮玉祥倒戈），同時，市內各重要路口佈滿了馮軍士兵，有些地方還用大車封鎖，禁止行人往來。這時空氣已夠緊張了。

緊跟著又聽到，曹大總統已被監禁，曹銳、李彥青等已被槍斃的驚人消息。這時我們還以為是軍閥們為了爭奪政權，才引起了這場突變，仍然與清室方面無關。

隨後，又從各方面傳來消息說，馮玉祥這次來京，不但要推倒曹錕，還要驅逐溥儀出宮，並沒收各王公府第。還有消息說，由於溥儀把宮內太監裁撤，引起了太監們的極大憤怒，有人把溥儀密運寶物出宮的情況向馮玉祥報告，因此馮要

逮捕溥儀，追還寶物。

我們聽到這些消息以後，確實感到十分驚愕和憂慮。像「皇帝之尊」的溥儀，在宮中所過的那種窮奢極慾的生活自不必說，就以我們這些王公貴胄而論，世世代代過的都是養尊處優、一呼百諾的極端優裕的生活，晴天霹靂地聽到行將危及生命財產的消息，又怎能不驚慌失措呢？我記得，為了溥儀的安全問題，王公、帝師、內務府大臣等召集了兩次「緊急會議」來商討對策。會議上是議論紛紛，莫衷一是。尤其是寶熙（宗室，時任總管內務府大臣），更是高談闊論旁若無人。但是會議最後毫無結果，人們都悄然垂頭而散。

綜合當時難以解決的問題，大致有下列三點：
1. 馮玉祥一貫的作風與其他軍閥有些相異，不但他本人，就是他的屬下從來不與清室方面來往，因而無法打通這條門路；
2. 溥儀避禍出宮，事實上牽扯的事情太多，一時也難找適當的住所。又顧慮到，假如所傳消息不確，豈不是自尋引火燒身之禍；
3. 敬懿、榮惠兩位太妃的安置問題，最感棘手，還有端康太妃的靈柩尚未抬埋，也不

能置之不顧。最後的結論是：另謀善策。其實就是「聽之而已」。

爲了說明我對溥儀出宮經過比較清楚，先得交代我與溥儀幼年時的情況。一九一九年我十二歲的時候，我跟英人莊士敦（R.F. Johnston）讀英文。後來莊士敦到宮內教溥儀英文時，就叫我到宮內伴讀。當時，還由溥儀降了「諭旨」一道，派我「毓慶宮行走，伴讀英文，紫禁城內騎馬」。每天上午，陳寶琛、朱益藩教溥儀讀漢文，由毓崇（貝子溥倫之子）、溥傑（醇王載灃次子，他在我以後到宮內伴讀）伴讀，下午則由莊士敦教溥儀英文。

在馮軍入城的前一個多月，因端康太妃（光緒妃）去世辦理喪事，我們暫時停止上學。可是溥儀一個人在宮內頗感煩悶，每天仍叫溥傑和我到宮內陪他遊玩。我們有時在養心殿（溥儀所住之處）東拉西扯地亂說一陣，有時也到御花園去遊戲。我們玩的高興時，就把「君臣」的關係扔到一邊，有時也打成了一團，因此彼此之間的感情是非常友愛的。

溥儀出宮前後

自馮軍入城以後，傳來的消息日趨緊張，我們深深地感覺到形勢逼人，遲早總要離開宮內。在出宮的前十來天，我們不再到處亂跑，也偷偷地商議過，認爲如果宮內不能居住時，唯一的安全地方就是天津租界。因爲早在一九二二年前後（詳細日期已記不清了），由於北京經常受到戰火的威脅，深恐溥儀一旦不能在宮內居住時，就無處可以避亂，就由我父親在天津英租界十三號路代溥儀買了一所樓房。這座樓和我家的樓房只

一牆之隔，爲的是溥儀將來居住時，可以隨時照料他的一切。我們也考慮到一旦離開宮內，對於生活費用以及出洋留學（當時也想到外國去留學）的經費，勢必感到極大的困難，因此，未雨綢繆，作了一些準備。

從一九二二年（日期已記不清了）起，我們就秘密地把宮內所收藏的古版書籍（大部分是宋版）和歷朝名人的字畫（大部分是手卷），分批盜運出宮。這批書籍、字畫爲數很多，由宮內運出時，也費了相當的周折。因爲宮內各宮所存的物品，都由各宮太監負責保管，如果溥儀要把某宮的物品「賞」人，不但在某宮的帳簿上要記載清楚，還需拿到司房載明某種物品賞給某人，然後再開一條子，才能把物品攜帶出宮。當時，我們想了一個自以爲非常巧妙的辦法，就是把這大批的古物以賞給溥傑爲名，有時也用賞給我爲名的，利用我和溥傑每天天下學出宮的機會，一批一批地帶出宮去。我們滿以爲這樣嚴密，一定無人能知。可是，日子一長，數量又多，於是引起人們的注意。不久，就有太監和官伴（宮內當差的，每天上學時給我拿書包）問我：「這些東西都是賞您的嗎？」我當時含混地對他們說：「有的是賞我的；也有修理之後還送回宮裡來的。」可是長期以來，只見出，不見入，他們心裡已明白大半，只是不知道弄到什麼地方去了。

這批古物運往天津時，又費了一番周折。這些書籍、字畫，共裝了七、八十口大木箱（詳細數字已記不清了），體積既大、數目又多。在出入火車站時，不但要上稅，最可怕的是還要受檢查。恰巧當時的全國稅務督辦孫寶琦是載淪（慶親王載振胞弟）的岳父。我找了載淪，說是醇王府和我們家的東西要運往天津，請他轉托孫寶琦辦一張免驗、免稅的護照。果然很順利地把護照辦妥，就由我把這批古物護送到了天津，全部存在十三號路一六六號樓內。有了這批稀世之珍來作溥儀將來的生活和留學的雄厚資本，所以認爲天津居住是最爲相宜，並且是有恃而無恐。

溥儀出宮的前兩天，我們趁養心殿無人的時候，從保險櫃裡取出些便於攜帶的珍珠手串等物，分裝在兩個小手提箱內，準備萬一的時候，好帶出宮去。

寫到這裡，我深深地認識到，爲了溥儀一人一家，不惜將稀世之珍盜運出宮，對國家、對人民真是一件無法補償的巨大損失，罪惡之大，使人不寒而慄。

在這緊張時期，擔任宮內守衛的護軍，爲了加強戒備，還表演了一幕滑稽劇。原來在辛亥革命後，由於溥儀留住宮內，就由兩部分部隊分別擔任紫禁城內外的警衛。神武門外，由十六師（原禁衛軍改編）一部擔任守衛，神武門內歸護軍擔任守衛。護軍統領由毓逵（奉恩將軍，宗室）充任。護軍人數並不多，我所看到的大概不足二百名，據說其中空額甚多。這位毓統領爲了做好宮內警衛工作，「奏明」溥儀，派員檢閱護軍訓練的情況，並檢查槍隻彈藥等。溥儀即派我隨同毓逵前往「檢閱」。我首先看了護軍演習分列式，只見這些位年將周甲的老官兵們，一個個噓噓作喘，隊形散亂，演習工夫不大，其勢不能不宣

告結束。我們又繼續檢查武器，只有爲了站崗所用的二十來支步槍外表還似槍樣，其餘大部份槍隻則被多年的鐵鏽所侵蝕，內外已成一體，標尺、槍栓休想動它一動。再檢查槍彈時，子彈和彈匣（鐵製的）也是鏽成一個整體。勉強拿出幾枚來看，子彈已然不似它的原來形象了，最後，我們又看了看指揮刀，有幾把是站崗配帶的還好，餘者刀和鞘永遠不會離開了。只好啼笑皆非地結束了這場檢查工作。

從這件事也可以看出，這個封建王朝，多年以來自上而下的腐敗程度實在達於極點了，封建統治階級其勢不能不被推翻。爲封建帝王所服務的這批武器，自然而然地也要伴隨著最後的這個「小朝廷」同歸於盡了。

緊鎖雙眉難交玉璽

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五日中午，我仍照例每天一樣乘馬車去往宮內。到北上門時，見有馮軍持槍放哨，我估計一定出了什麼事故，可是又無法折回。正猶豫間，有數名馮軍士兵將馬車攔住，問我：「你到這裡有什麼事？」我說：「上邊（指溥儀）叫我來的。」那士兵說：「等我請示回來再說。」等了許久，他回來對我說：「溥先生已然不在這裡，我們送你去看他去。」當時，也不容我再說什麼，叫我下了馬車換坐一輛汽車，有一士兵跟隨，就一直向北駛去。我心裡想此去一定凶多吉少，只好「聽天由命」罷。

我初未料到汽車竟開到北府（即卞利海醇王府，以下簡稱北府），只見府門內外軍警林立，

特別是阿斯門（有一對石獅的大院）外，有很多持大小槍隻和背大刀の士兵，其勢如臨大敵，使人感到十分不安。隨我來的那一士兵和另一個士兵（馮軍官兵服裝一律，使人無法辨別）說過幾句話後，又由兩個持槍的士兵簡單地把我身上檢查了一番，將我送入一間小屋，在這裡與溥儀、溥傑見了面。

當時，我們三人真是驚喜交集，不過驚的成分多一些。我低聲問溥儀：「爲什麼不早通電話呢？」溥儀說：「打了兩次都不通，大概是電線已然斷了。」傍晚時候，僕人送進一提盒飯菜。因爲我們驚魂未定，每人只吃了一點就拿走了。六日晨，按照夜間我們所商妥的方法，由我出去以取漱盥用具爲名，設法找我父親探問消息，最要緊的是叫他急速設法來營救。我試探性地和馮的士兵商量了兩次，那士兵對我說：「沒有上邊命令是不許可你們出去的。」我們聽了之後，真是啞然若失，知道已然是毫無辦法可想，只好聽候處理了。由五日至七日，內外不通，消息隔絕。我們真是度日如年，如坐針氈地度過了三天。

八日中午，忽然來人對我說：「有人要見你們，現在隨我去。」我們隨同來到了「大書房」（這裡原是我五伯載灃會客休息之所），看見我五伯、我父親、載澤（宗室、奉恩鎮國公）和榮源（溥儀岳父，時任總管內務府大臣），都在這書房之內。見面之後，才知道我父親他們也是從五日到了北府之後就不許出去了。我父親對溥儀說：「大概是鹿鍾麟（北京警備總司令）要來，

我們先研究一下都和他講什麼？」經大家商定，等溥儀與鹿談話之後，由我父親再向鹿提出所商定的幾項問題。因爲我五伯平素膽小怕事，不善於言談，且自溥儀到了北府之後，外面被軍警包圍，情勢十分緊張，因此更使他驚慌失措，終日緊鎖雙眉，一語不發。

下午三時左右，由紹英（總管內務府大臣）陪同鹿鍾麟、張璧（警察總監）來到北府與溥儀會面。鹿首先問：「溥先生對政府所修正的清室優待條件有何意見？」溥儀答：「政府對清室方面這樣優待，我非常感謝，並無任何意見。」鹿問：「溥先生對取消皇帝尊號有何感想？」溥儀答：「我對於取消皇帝尊號是完全同意和愉快，因爲我對宮廷那種不自由的生活早已感到厭煩。今後，我能夠做一個中華民國的自由平民，我感覺非常高興。」鹿問：「溥先生將來有什麼打算？」溥儀答：「關於我個人的將來，現在沒有什麼打算。我只希望能在北京有個住處，仍舊繼續讀書。將來政府能夠許可的話，我打算出洋留學以求深造。」鹿說：「溥先生所談的很好，關於住處問題，政府一定要妥善安置。」這時張璧又對溥儀說：「溥先生所談的我們感到滿意。但是還有兩個問題，要求你趕快解決。第一、關於玉璽的問題，溥先生既然同意取消皇帝尊號，你留著那塊玉璽還有什麼用處，應當現在就把它交出來；第二、應當把皇室私產全部交出來，將來經過政府查清之後，如果認爲哪些是歸你所有，政府還要發還給你。」衆人聽了要玉璽的話以後，一時瞠目不知所答。溥儀思索了一下就對張璧說：「

我確實沒帶出什麼玉璽來，如果有的話，留著也是無用，一定把它交出來。至於皇室私產，一向由內務府管理，我不清楚，紹英現在也在這裡，可以叫他吧皇室私產全部交出來。」張璧聽了，帶出很不樂意的樣子說：「皇室私產既然溥先生答應全部交出，為什麼這塊傳國玉璽還不肯交出來呢？」

這玉璽的問題來的非常突然，一時無人答覆，要形成僵局之勢。我父親就向張說：「皇室私產無問題。至於這塊玉璽，據我所知，按清朝制度是每換一位皇帝就重刻一次玉璽，從來沒有什麼傳國玉璽。」張璧用強硬的腔調說：「就是那塊歷朝相傳的『金鑲玉璽』。」載澤連忙向張璧解釋說：「清朝歷代皇帝所用的玉璽，確如載瀛先生所說的那樣，張總監所說的那塊玉璽，大概指的是秦代李斯所篆的那塊和氏璧罷？那塊玉璽不但在清朝就沒有看見過，就在清朝很早以前已然失傳了。如果張總監要玉璽的話，請您到宮內交泰殿，清朝歷代皇帝所用的各種玉璽都在那裡存放。」張璧聽了之後，雖然有些不大相信，可是也沒再追問，又向溥儀和紹英說：「那麼，你們先把皇室私產交出來罷。」紹英顯出非常為難的神氣向張璧說：「內務府所管的皇室私產，除在鹽業銀行所存的現款可以很快地交出外，還有房產、土地很多，這些年來我們就沒清查過。現在有極少數按季交租銀的還可以查得出來，不交的我們連房產、土地究竟有多少，座落在什麼地方也沒有弄清楚。」張璧問：「難道這些房產、土地就沒有契約、合同可查嗎？」紹英說：「契

約、合同有的是。現在庫裡存放。如要清查的話，就是每天用筐子來抬也得抬上幾天。最好我們雙方派人一起清查罷。」

據紹英所談，可以看出歷代封建統治者們，爲了個人的窮奢極慾，不知掠奪了多少人民的財富。就以內務府所管的房產、土地來說，眞要是徹底清查出來，一定得出一個極爲驚人的數字。同時，也可以看出，這些皇室私產，名爲內務府管理，事實上等於不管理。內務府內部的腐化無能，也是達於極點了。

愛說笑話沖淡緊張

談至此處，張璧也感到問題的棘手，沒再說什麼。最後鹿向溥儀說：「一切問題留待以後商議處理罷。溥先生還有事嗎？」我父親連忙向鹿說：「我們有幾件事要向鹿總司令商議。」鹿答：「可以提出來罷。」我父親便說：「第一、溥先生自到北府後，他們三個人（指我和溥傑）住在一間小屋，實在感到不便，可否移到一所較大的房子居住？第二、可否把屋門外和院內的崗哨撤去，並許可到他祖母院裡看看去？第三、溥先生來到北府已四天，不但衣服沒有換的，就連臥具、漱盥用具等物一概皆無，可否派人到宮內取出？第四、可否許可找回幾名外隨侍（裁撤太監以後，所僱的男傭人稱爲外隨侍）和廚役，以便照管溥先生的日常生活？第五、可否允許我們本族人和師傅們（指陳寶琛、朱益藩、莊士敦）到北府與溥先生見面？第六、溥先生出宮時，未帶出現款來，可否由內務府所存款項中暫撥一部

分使用？第七、三天以來，由於禁止一切人等出入府門，以至廚役無法到外邊購買米麵蔬菜等等用品，因而府內人等吃飯已大感困難。還有我們幾個外來的人，也三天沒有出去換換衣服或到家看看，可否准許外來人和府內廚役自由出入？最後，我們懇請鹿總司令和張總監對兩位太妃（瑜、瑨二太妃）遷出宮外的問題不要操之過急。因爲她們在宮內已經住了幾十年了，一旦遷出，自然是有些難捨，而且她們都是年老體弱的人，最好是先在外邊把房子找妥，我們一定勸她們遷出宮來（當溥儀出宮之時，也讓兩太妃同時出宮，但兩太妃不但不遷出，並以死相拒。故對鹿、張作此請求）。」鹿答：「這些問題容我回去研究後再作答覆。」

鹿、張將要辭出時，榮源突然向鹿、張二人說：「你們這樣做事，實在太欺侮人了。」榮源平素有些輕微的精神病，大概由於當時的空氣過於緊張，精神一時失常因而說出這番話。幸而鹿鍾麟一笑置之，並未答言。張璧回答說：「請榮先生冷靜一些罷，這是沒有辦法的，來日方長，我們以後還要見面，不要著急。」這次會談就在這十分尷尬的情況下宣告結束。事後，大家對此深以爲憂，恐怕由此又要引起更嚴重的後果。經過溥儀與我父親和載澤商議的結果，此後不再讓榮源參加任何會談，免得另生枝節。

鹿、張走後，我們三人即回小屋。我們研究了適才鹿、張的談話，認爲雖有榮源最後這一場「軌外行動」，根據鹿鍾麟的談話，可能不致發生特殊的危險，此時，溥儀又開始說起笑話來了

。我們經常和他在一起的人，都知道他這種特殊的作風，不論在任何緊張忙亂的情況下，總是突然而又天真地說上幾句笑話，有時也效仿別人動作的特徵，使人笑不可支。這樣，就把一時的緊張氣氛沖淡下來。我們對他這種舉動感到興趣。這天夜裡，由於他說了笑話，我們又忘其所以地低聲說笑起來。

九日上午，紹英來到北府，傳達了鹿鍾麟對昨天所提出各項問題的答覆，大意是：對我們所提出的各項問題大體表示同意，並且有的問題從今日起即可照辦。但有必須注意的幾項是：1. 派人到宮內去取東西只限於日常所用的衣服、器具等物。養心殿內的古玩、陳設、木器等一概不許持出；2. 准許溥儀會見外來之人，但絕對不許外國人來見；3. 許可內外人自由出入，暫時還不許年輕人出入（當時雖未說明何意，大概是怕溥儀混出北府）；4. 兩太妃遷出宮外，最遲不許超過二十天。爲了特殊照顧她們，許可把她們宮殿內的陳設、木器以及日常用品帶出宮去。對玉璽和榮源的行動卻只字未提。我們感到十分安心和滿意。

正午過後，果然屋門口和院內的士兵全部撤去，當時我們真像鳥出樊籠一樣的高興。下午我們就搬到溥傑夫婦所住的「樹滋堂」，這裡要比那間小屋寬敞舒適多了。

我父親和載澤他們也到家看望之後，晚間又回到北府。只有我一個人，因爲「年輕」的關係，還不許出去。好在我父親已把我的衣服等物帶到北府，也就安心在北府住著罷。晚間，我隨溥

儀到了我們祖母和三庶祖母院裡看了看，又談了這兩天的經過情況。溥儀也和他的妻、妾（在宮內稱爲皇后、淑妃，她們隨溥儀到北府之後，即和我祖母住在一起）也見了面。我們回到「樹滋堂」後，因爲三、四天沒有睡覺，感到十分疲倦，真像經過了一場暴風雷雨之後，恬靜而又舒適地睡了一夜。

鑲鑽小帽失蹤之謎

九日派人到宮內取東西時，發生一件直到今天也沒有打破的「謎」。事情是這樣：按照雙方議定，派人到宮內取東西時，由雙方各派大員前往監視。溥儀這方派的是紹英、耆齡（總管內務府大臣）、毓邀前往監視，並帶有護軍、外隨侍共八、九個人。鹿鍾麟派的是張璧前往監視。紹英等臨行前，溥儀囑咐他們說：「你們務必把『佛格』（狼犬名，這條狗曾在德國警犬學校畢業，受過嚴格的訓練，溥儀用重金買妥後，由專人自德國送到北京）牽來。還有我常戴的一頂帶有鑽石帽花的小帽也給我拿來。」他還指明在養心殿東暖閣的炕桌上放著。傍晚時候，紹英等人來到北府對溥儀說：「衣服、用品等項和狼犬都已取來，只有那頂小帽沒有找著。」據紹英說，當他們進養心殿時，曾親眼看見那頂小帽確實放在東暖閣的炕桌上，正當大家忙著取東西時候，他親眼看見張璧圍著那頂帽子一轉，就用他戴的那頂呢子禮帽扣在那頂小帽之上，以後那頂小帽就蹤影皆無了。在旁邊的耆齡也附和其說。雖然，他們是言之鑿鑿，真偽究屬難辨，記之聊作一段

笑話來看罷。

自十日起，門禁稍寬的消息很快地傳到外邊。王公、遺老舊臣們是紛至沓來，北府大書房內，真是「群賢畢至，少長咸集」。當時還沒有「奏事官」（即傳達），就由我和溥傑把這些人一個一個地帶到「樹滋堂」去見溥儀。

溥儀要行刺馮玉祥

正午將近，溥儀（恭親王溥偉胞弟，號心齋，畫家）來到北府。適值溥儀也在大書房。溥儀見屋內人多，就對溥儀說：「奴才（凡王公、宗室對皇帝都自稱奴才）有密奏的事，這裡人太多。」溥儀拉著我和溥儀來到「寶翰堂」（與大書房相聯）。溥儀跪在地下痛哭流涕，即從懷中取出一柄小型匕首。我和溥儀一見，大吃一驚，不知他意欲何爲。溥儀說：「奴才見皇上到了這般地步，心中實在難以忍受，要用這把匕首刺死馮玉祥或是鹿鍾麟，以雪此恨。」溥儀急忙把那柄匕首搶到手中，然後對溥儀說：「你的忠心固然可嘉，但你要知道我正在患難之中，如果你不顧一切地做出此事，不但對我是有百害而無一利，更要加深我的苦難，今後，你千萬別這樣任性胡爲……」

溥儀勸了他很大工夫，他才低頭拭淚而退。溥儀當時囑我不要和別人說。及至我們到了「樹滋堂」，溥儀從懷中將這柄匕首拿出一看，原來是一把裁紙所用的小刀而已，覺得此事非常可笑。溥儀就把這柄「匕首」擺在書桌上，時常引爲笑談。

各顯神通進行營救

十日下午，大書房內真是座無隙地，王公和遺老舊臣們開始商討如何積極營救溥儀的辦法。議論中間，鄭孝胥（時任內務府大臣）還有他兒子鄭禹，都極力主張效申卞胥哭秦庭的辦法，向日本使館請求派軍隊保護溥儀離開北府到東交民巷避難。鄭氏父子的意見，當時即遭到我父親和戰澤以及陳寶琛、朱益藩等人的反對。他們認為日軍來到之後，如果和這裡駐守的馮軍衝突起來，不僅溥儀要受到很大的危險，還有醇王的一家也不堪設想了。鄭氏父子聽罷，露出很不滿意的神氣，不一會終究悻悻然而去了。（鄭的陰謀活動，後邊還要談到。）眾人研究了許久，最後決定：大家盡一切力量分頭向各方面急急營救。

先把王公方面所進行的營救辦法敘述一下。

據戰澤說，以前因為東陵的關係（什麼關係已記不清了），與楊宇霆、常蔭槐頗為熟識，時常在一起打牌、吃飯，擬即致函楊、常，轉託他們向張作霖求援。我父親在十一日晨，同莊士敦到使館方面進行營救。先拜訪了荷蘭公使（名姓已記不清了）因為當時他是駐華外交使節團團長，並且在北京多年，與我父親和我都很熟識，時常到他家作客。我父親和莊士敦把溥儀出宮的經過和請求援救的話和他談了之後，他很表示同情。當即商定了兩個辦法：1. 先以各國駐華公使的名義，口頭通知馮玉祥總司令，要負責保障溥儀的生命安全；2. 由各國公使分電本國政府，以各國政府的名義請中國政府即日恢復溥儀的自由。他並

且向我父親表示，至遲在明天即召集各國公使開會，如果有其他國家公使不同意的話，荷蘭方面一定要這樣去做。隨後，又訪問了英、法、比、意等使館（是否還有其他使館已記不清了），他們也都表示支持和援助的意思，後來莊士敦對我說，因為他最討厭日本人，所以沒到日本使館。

當日下午，我父親又去到旃檀寺馮軍司令部，打算和馮玉祥直接面談。但是未能見面，傳出話來說：「馮總司令開會太忙，有什麼事可向黃代總理（黃郛）去談。」隨後，我父親又見了黃郛。因為他和我父親以前就認識。在我父親任軍諮大臣時，曾保送他去日本留學。在顏惠慶內閣他任教育總長時，和我父親也有往還。我父親把來意與黃說過之後，黃表示：「溥儀的安全，決無問題；恢復自由，需待段祺瑞、張作霖到京後才能解決。」

我父親回到北府，和戰澤等研究了營救經過的情況，認為溥儀的安全可無問題，只是恢復自由依然困難重重。這時，有醇王府大管事張文治自告奮勇地向我五伯載澧和我父親說：「聽說張作霖快要到天津了，請王爺（指載澧）和您給他寫封信，我即刻就到奉天把信交給他，請他趕快設法援救。」提起張彬舫（張文治號）來，當時在北京也確實是「赫赫有名」的人物。他雖然沒登上過政治舞台，可是他以醇王爺的大管事的身分，與軍政大員都有相當密切的往來，特別是和奉系方面的張作霖、張景惠、湯玉麟等都是盟兄弟。我父親和戰澤認為他這辦法很好，因為他父親和張作霖以及奉軍其他將領們也很熟識。早在

第一次直奉戰爭前，張作霖在北京時，有時也請我父親吃飯看戲。我父親同吳俊陞、湯玉麟等人時常到天壇騎馬，感情方面搞得相當不錯。因此，當時就決定以載澧、載瀾、載澤及全體滿洲王公的名義致函張作霖，請求營救溥儀。信的大意是：十一月五日，馮玉祥總司令以武力強使宣統遜帝出宮，軟禁於醇王府內，軍警日夜包圍，生命危在旦夕。懇請上將軍主持正義，速解倒懸，即日致電馮總司令切實保障宣統遜帝安全，恢復自由等語。當夜，張文治即帶信離京去奉。

當時，寶熙也在蒙古王公和滿族舊臣方面進行了營救活動，還到了滿蒙協進會，打算召開大會，發表營救溥儀的宣言。寶熙到該會的正副會長那王、貢王（那彥圖、貢桑諾爾布，蒙古王公）的府裡商議時，他們是支支吾吾，畏避不前。還有些滿族舊臣們，早已逃往東交民巷或天津租界隱藏起來了，因之使會議無法開成。據我所知，像家財特別豪富的滿族王公慶王載振一家，舊臣如那桐、增崇等全家，早就跑到天津租界裡享受「清福」去了。這件事也很好地說明當時所謂滿蒙上層人物的一種「協進」表現。

遺老舊臣方面的營救活動，由於他們人多，辦法也多，更形成「五花八門、各顯神通」的局面。就以執遺老舊臣之牛耳的陳寶琛、朱益藩來說，他們的意見大體與王公方面相同，不主張請求外兵強把溥儀挾出北府。其他如何劭恣，則同莊士敦到英國使館進行活動；馮恕（北京電燈公司創始人）則去天津求援於段祺瑞；類似朱汝珍（南書房行走）那些不勝枚舉的遺老們，則分別

向天津、上海、廣州等地所住的遺老舊臣們救援，並通過他們向當地軍、政、報界以及社會團體等等多方面進行呼籲，請求主持正義，即日恢復溥儀的自由。

除了一心一意投向日本帝國主義懷抱的鄭孝胥外，還有兩個人表現得比較突出。一個就是羅振玉（南書房行走，後任偽滿參議府參議），他那時經常住在大连，和日本帝國主義分子早就勾勾搭搭。在營救溥儀的時候，他那種老奸巨猾的手段確比鄭孝胥要高出一籌。他矢口不談什麼借助外力的話（暗地裡與日人勾結），曾兩度去天津向段祺瑞求援。我記得他每次由津來京時，總是沒回家就來到北府，向溥儀和王公們報告他在津與段會見的經過。當時溥儀以及王公等，對他那種不顧年邁、不辭辛苦的精神都一致表示贊許。他總是裝出一副「慷慨激昂」的神氣說：「君辱臣死，我只有鞠躬盡瘁而已。」當時，我們都把他看成一個「忠貞可嘉」的人物。再一個就是金梁（時任內務府大臣）。表面上來看，他不但態度驕傲，還像帶些瘋癲之狀。他對於王公和一般遺老舊臣們，彷彿都不屑與之一談，專門鬼鬼祟祟地一個人跑到「樹滋堂」和溥儀秘密私語。有時也和鄭孝胥同去。在王公方面，認為鄭、金是兩個最可怕的人物。

當時，我五伯載灃對鄭、金兩人的這種鬼鬼祟祟的行動頗為憂慮，總怕他們引來外國軍隊挾走溥儀。到那時，不但對溥儀有很大的危險，更可怕的是給整個的醇王府帶來不堪設想的災難。我五伯與我父親和載澤商議的結果，由於我父親

和載澤雖與溥儀有叔侄之親，但限於「君臣之禮」，不經過「召見、請見」的手續，就不能隨便到溥儀所住之處（在宮內如此，到北府後仍是如此），只好由我五伯親自出馬到「樹滋堂」擔任這項「監視」工作。像我五伯那樣不善於應付一切事務而又怕事的人，怎能做好這種工作呢？鄭、金雖然在「樹滋堂」常和溥儀談話，及至見了我五伯則閉口不言，溥儀也「顧左右而言他」。我五伯去了兩天，見毫無作用，就到大書房氣憤憤地與我父親和載澤說：「我去了他們就不談了，簡直沒法辦，只好聽彼等所為罷！」

十四日以後，相繼得到情勢緩和的消息。莊士敦傳來的消息說，有些位公使已得馮玉祥將軍的答覆，對溥儀的安全決無問題；恢復自由日內即可解決。又如馮恕、張文治等也先後回京說，段祺瑞、張作霖已與馮玉祥交涉好了，不但要保障溥儀安全，駐守北府的馮軍日內即可撤去。段、張還表示，對黃郛內閣所修正的清室優待條件不能同意，等他們到京之後，對溥儀的居住問題一定要妥善安置。

從十七、十八日起，駐守府門的馮軍已日漸減少，由警察和保安隊前來接替。門禁也更加放寬，年輕人也可以自由出入。往來信電，既不檢查也不扣留。這一時期，從表面來看卻呈現出一種暫時的小康狀態。然而在內部，鄭、金、羅等人日甚一日地加緊進行陰謀活動。最後，溥儀的命運也就完全被他們所掌握了。

待機而動投機分子

鄭孝胥得與溥儀接近並當上了總管內務府大臣，可以說是由陳寶琛一手造成的。據說（我不十分清楚）鄭在上海時，曾在商務印書館做事，兼以賣字為生，由於生活景況不佳，把在上海的住房賣掉來到北京，想從政治上撈它一把。可是他那如意算盤連遭失敗，就不得已而思其次地找到陳寶琛之門。陳、鄭既是舊雨，又是同鄉，就把鄭引荐宮內。當時有些遺老們對於鄭有些看不起，因為他既非翰林，又不是前朝的高官大吏，就有人說他是「暫隱清宮，待機而動」。

鄭到宮內大約是一九二三年左右（已記不甚清了），最初說是給溥儀講書。由於他的巧言善辯，逐漸得到溥儀的寵信。從旁又有陳寶琛的大力支持，不久就一躍而為總管內務府大臣，為的是叫他改革內務府多年以來的腐敗積習。當時這個「小朝廷」，在「聖旨」不出神武門，「封官」只限內務府的情況下，總管內務府大臣竟有紹英、耆齡、寶熙、榮源、金梁和鄭孝胥六位之多，這也是「回光返照」下的盛極一時罷。鄭到任後，還想大刀闊斧地認真整頓一下，無奈內務府早已病入膏肓，已到無法救治的地步，再遇到一個利慾薰心的鄭孝胥，更弄得一場糊塗。

內務府的職員，大都是世代相承的職業，由於世代貪污，積累的家資有的甚至駕於一般王公之上。自從派了鄭孝胥以後，因為他以漢人而充內務府大臣，由紹英以至大小官員，都抱不滿態度。他們紛紛議論說，這幾位新貴實難伺候，我們回家抱娃子去罷。不少家資富有的官員們都相繼辭職，甚至有的就不辭而別了，連承上啟下最

主要的堂郎中，竟懸缺無人。鄭還想利用此機，就把他既親近而又同鄉的修濟煦補爲堂郎中，但內務府已成頭重腳輕、有官無兵的局面，鄭只好徒喚奈何而已（當時我岳父增德任內務府卿，對我講的這些情況）。

鄭孝胥對各方面的拉攏手段，也是八面玲瓏。由於他到京未久，尙未孚衆望，因而對陳寶琛、朱益藩這兩位帝師，真是恭維備至，百般討好。尤其是對於陳寶琛，他知道溥儀不但對陳是非常敬重，並且對陳所說的話也是百依百隨。我記得每當溥儀做出任何人都不能勸阻的事情時（其實都是些瑣事），總得請陳老師上殿才能挽回。所以鄭對陳，總以後輩自居，頗得陳的信任。在王公方面，他很願意和我父親交結。可是我父親一向不愛和那些騷人墨客往來，總說他們「酸氣」；偶然相遇，只是敷衍一下罷了。他見此路不通，就和溥儒、溥忻（貝子，號雪齋，書畫家）常以吟詩弄墨互相往還。鄭對莊士敦也是特別拉攏。他知道溥儀對莊士敦所說的話也非常聽信，就借著與莊士敦互相研究中國古典文學、佛學爲名，彼此之間十分友好。莊士敦時常對人稱贊鄭在遺老之中，是一個很有才幹的人。由於鄭孝胥用的這種八面玲瓏的拉攏手法，果然很快地就取得了自上自溥儀下至王公、帝師、遺老舊臣們的相當重視。

當時，鄭孝胥還利用他的政治地位，由他的兩個兒子鄭垂、鄭禹（皆精通日語，與日本使館方面早有聯繫）逐漸和日本使館方面勾搭起來。還不止此，我記得溥儀正在北府時，溥忻在大書

房對大家說：「段祺瑞快要到北京就任執政組織新內閣了。聽說已然內定鄭蘇戡（孝胥字）不是教育就是交通總長。」不多時，鄭也來到。溥忻趕忙上前，連呼蘇老，預祝他將榮任總長。鄭滿面得意地說：「還沒發表。」雖然後來一直沒有發表，可見鄭、段之間也有相當的拉攏。鄭之爲人，若從他的外表來看，卻像是個道貌岸然的學者，其實卻是一個野心勃勃、十分險詐的投機份子。

鄭孝胥的政治投機眼光卻也不容輕視。他也看出當時在國際方面，有虎視眈眈、早想侵吞中國的帝國主義國家，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；國內方面，在軍閥互相殘殺的混亂局面之下，各地不僅存在著爲數不少的強烈幻想復辟的活動分子，甚至還有一部分幻想復辟的軍閥和政客，特別是在東北奉系勢力範圍之內。因此，鄭把溥儀早看成是「奇貨可居」，怎能輕易地放手呢？他看見溥儀到了北府之後，對外應付差不多都由我父親和載澤來處理，他認爲溥儀又落到了王公之手，更是格外眼紅。爲了達到他的陰謀目的，爲了把溥儀壟斷到他一人之手，首先必須離開溥儀和王公之間的關係。這時，他一方面積極地拉攏陳寶琛和莊士敦，爲的是容易勸說溥儀離開北府；另一方面，他暫時和羅振玉、金梁緊密地勾結在一起，爲的是把溥儀引誘出北府之後，再由他一人獨攬大權，進行投靠日本帝國主義，進行陰謀復辟的活動。果然，由於溥儀少不更事、胸無主見，當時又處在那種險夷難測的環境之中，就使鄭孝胥的陰謀活動得以順利進行。

不肯扔掉皇帝架子

鄭孝胥的陰謀活動能以得逞，卻也不是偶然的。他不僅了解並且也掌握了當時的客觀情況。先以溥儀個人來說，由於他自幼即住在那深宮之內，不用說對社會上的一切事務缺乏經驗，就是家族間的長幼稱呼他都弄不清楚。其實，這也是不足爲奇的。就以我這個封建家庭的王公子弟來說，在進宮念書之前，還要先跟我父親和年老的太監學習好多天的宮廷語言和禮節。及至我初次到宮內的時候，感到宮內簡直可以說是「別有洞天」，紫禁城內和紫禁城外雖只一牆之隔，卻像把人帶到純封建社會時代一樣。我看見溥儀從養心殿到毓慶宮來念書的時候，雖然是短短的幾步路，還要端坐在一乘明黃色的小轎之上，由兩個太監抬著他。轎子的周圍，還有成群的太監前呼後擁，叫人看起來，有些「神聖不可侵犯」之感。據太監們說，這是皇上的尊嚴，宮廷的體制。我初見溥儀時，他穿的是長袍馬褂，背後垂著一條長長的辮子。據太監對我說：「萬歲爺（宮內太監都是那樣稱呼溥儀）的穿戴打扮可跟從前大不一樣了，維新多了。」看他們說話的表情，帶有過於「維新」的意思。太監們見了我總是譏笑地說：「哪有府裡的爺們不留辮子的。大概念洋文就不留辮子了。」當時，如陳寶琛、朱益藩以及毓崇都有辮子。每逢我們遇在一起時，我總感到有些侷促不安。當時，王宮內所保持的那種封建氣氛，確實極端濃厚。溥儀的日常生活，可以說是與辛亥革命前的皇帝生活完全一樣。

自從莊士敦到宮內教授英文之後，在書本裡面或言談之中，溥儀才開始接受了一些比較新的知識。例如他感到那條辮子過於腐敗，同時也看見我沒有辮子，後來他就不顧許多人的勸阻，違反了「祖宗家法」，毅然地把那條永不許動的辮子剪掉。其實，這本是一件小事，可是當時在宮內就成了一件「翻天覆地」了不起的大事了。又如莊士敦對於太監頗為厭惡，時常對溥儀說：「現在只有中國還有太監，實在太腐敗了。」當時，宮內太監的腐敗情況也確實相當嚴重，因而在一九二三年前後（詳細年月已記不甚清），溥儀就把宮內太監裁撤（關於裁撤太監的一切經過，因與本文無關，將來另文記述）。在這一段時期，我感到他似乎有些厭惡宮廷的腐化生活的表現。

我和溥儀，由於相處日子一長，漸漸地就不被那種「君臣之禮」所限，後來也就無話不說了。我記得有兩次我和溥儀要出宮回家的時候，溥儀很高興的樣子對我們說：「我真羨慕你們兩個人這樣出入自由，實在比我這樣鎖在宮裡強多了。」有時我們也談到將來出洋留學的問題，幻想著怎樣一起到英國去念書。就是到了北府之後，他也和我們說過：「這可好了，今後我也是一個平民了，將來我們能夠隨便出去的時候，我們想到哪裡都可以的。」

畢竟由於溥儀從小就受的是那套完整的、道地的封建統治階級的教育，並且也習慣了那種宮廷式的生活，不能不說是打上了階級的烙印。後來他雖接受了一點比較新的思想，也僅僅就是那

種腐朽的資產階級思想，那是毫無所補的。因此，溥儀在出宮之後，依舊不肯扔掉他那「皇帝」架子。在他周圍的王公、遺老舊臣，依舊把他奉若「至尊」，依舊偷偷摸摸地行那「君臣之禮」。最可笑的，把被逐出宮來到北府的溥儀，美其名曰「皇上蒙塵」。雖然，溥儀口口聲聲說，願意做一個平民，可是他所說的平民，似乎是一個不丟掉皇帝身分的平民。而王公、遺老舊臣們也和溥儀所想像的完全相同，只要溥儀不丟掉皇帝身分，大家還謹守「臣節」，這就心滿意足了。當時，在公王、遺老舊臣之中，許多人雖沒搞什麼復辟活動，可是對復辟也不持反對態度，並且對那套封建制度還有些依依不捨。在這種情況下，那些陰謀復辟分子們，當然可以為所欲為了。

王公懦弱不務正業

我到宮內之後，看到溥儀和王公之間的隔閡是十分突出的。一般的王公更不必提，就是近支王公也要比遺老舊臣們疏遠的多。例如，溥儀和我五伯載灃雖是父子之親，可是見面談話時是非常客氣，時間也很短。我在旁邊也聽過幾次，談話的內容，每次總離不了天氣的冷暖，和日常生話上的飲食起居等等那些細小問題。我從來沒聽到有關時事方面或其他比較重要問題的談話。溥儀和我父親之間的關係，在王公之中，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了。有時也把我父親找進宮內，對於他個人的某些問題或是宮內的婚喪等事，互相商議處理，可是也不能開誠佈公地來談。遇到彼此不好談或是意見相左的時候，就叫我做一個傳聲

筒。如我六伯載洵（載灃胞弟，貝勒），雖然和溥儀也是叔侄關係，可是在我的記憶裡，他和溥儀坐在一起談話的事，簡直一次也想不起來。其他王公有極少數還見過面，大多數溥儀根本就不認識。當然，其中也有歷史原因存在，不需多述。僅就當時的情況來說，從辛亥革命以後，王公們在宮內已無任何職守，大都在各人府邸之內養尊處優。按宮廷制度，王公們如不經皇帝召見或是有事請見，誰也不敢隨便進宮；而且皇帝對於王公們的禮節規矩，向來是比對漢族大臣的要求更為嚴格，真有動輒得咎之感。所以王公們對進宮去見皇帝都視為畏途，就是有事想去見的，也怕偶一不慎，鬧成「失儀之罪」，還是不如不見。因此，就造成溥儀和王公之間極端隔閡的現象。

我還感到溥儀對待王公，總認為多半都是無能，帶些輕視的態度。這也並非偶然的，其中卻有些原因存在。我會聽我父親和長輩們談過辛亥革命前夕的一些情況。據說，當時西太后和王公大臣們，對於清朝將滅亡的那種混亂的政治局面，絲毫不加過問。只一心一意地研究京劇。宮中府中，每日鑼鼓喧天，晝以繼夜，有些王公們都能粉墨登場，時常演到天已大亮，來不及把臉洗淨就得進宮應差。那時，宮府之中的京劇可稱盛極一時，辛亥革命後，一度銷聲匿跡，民國三、四年後又開始活躍起來，幾乎每月輪流在各王府都要演出幾場。如溥侗（字西園，溥倫胞弟，鎮國將軍，別號紅豆館主）對京劇、崑曲造詣殊深，在王公票友中，可稱首屈一指。像我六伯載洵

、我父親和溥倫等人，對京劇藝術，也有相當的水平。我在七、八歲時，就隨我父親登台演戲。當時，蒙古王公也時常參加演出。後來發展到和京劇著名演員如尚小雲、楊小樓、郝壽臣等合作演出，因此，王公們演戲的名聲真是轟動一時。

還有對京劇不愛好的王公們，像溥沂、溥儒等就以琴棋書畫來自娛。他們不僅在書畫上有相當的水平，就是在古琴、曲藝上也有研究。還有不少王公們，因在民國初年府內遺有餘資，飽食終日，盡情追求享樂。在舊社會時代，對於戲曲十分輕視，尤其是以王公貴胄的身分搞這些文藝活動，更與人以口實。因此，不但在遺老舊臣方面，就是滿族群衆中間也經常聽到帶有諷刺性的談論，說辛亥革命前由於親貴當權把清朝已然斷送了，現在這些王公不是琴棋書畫就是粉墨登場，因此結論總是「不務正業」。這種論調，由遺老舊臣以及宮內太監的口中，很自然地就傳到了溥儀耳內，因此溥儀對王公的看法就是懦弱無能、不務正業了。

十八日以後的北府，雖然情況緩和，在表面上呈現一種平靜狀態，但在內部卻由於鄭孝胥等的積極活動，很快地就起了相當大的變化。在這時，由北洋政府和清室雙方已經成立了一個「清室善後委員會」。清室方面組成了一個以載瀾為首的代表團，其中包括有紹英、耆齡和寶熙等約六、七人（人數、姓名已記不清了）。北洋政府方面有李石曾、張璧等多人（也記不清了）。每日開會，會議主要內容是：歲費、皇室私產和清宮管理權等問題特別是在歲費數字上爭執不休

，毫無結果，後來就成爲膠著狀態。王公方面的主張是：一面開著這個善後會議，另一面是已經得到段祺瑞、張作霖即日到京的消息，等段、張到京後再商討解決辦法。

此時鄭孝胥和金梁二人在緊密勾結下，幾乎每天輪流到北府與溥儀進行密談，有時也在一起吃飯。當然，他們所談的內容我是不得而知，可是，從溥儀的言行上，我完全可以看出，他和初到北府時對我父親和載澤的態度是大相逕庭。他不僅和我父親他們日益疏遠，就是在談話中也帶出不滿的意見。我記得他和我說：「你阿瑪（滿族稱父親爲阿瑪）和載澤他們總是叫我一看、等一等，不知要等到何時爲止。夜長夢多，將來不定又起什麼變化。」當時，我對溥儀的談話頗表同情，殊不知已中了鄭、金等離間之計。更因溥儀一貫對王公們的輕視，認爲看看、等等這種辦法，就是懦弱無能的表現。這樣，就使鄭、金的詭計迅速地取得成功。

同時，鄭孝胥對陳寶琛、莊士敦也積極進行拉攏。有一天莊士敦叫我到他家談話，大意是說他已經和鄭、陳商議過，他同意鄭的意見，早日使溥儀離開北府，另找一個安全的住處，叫我父親好好考慮一下。因爲莊士敦和我父親感情很好（莊士敦進宮內教英文，是由我父親所介紹），所以才把這話透露出來，並不是鄭叫他說的。我和我父親說了之後，經過大家商議，結果還是看看再說。莊士敦聽了之後，對王公方面的主張也表示不滿，鄭孝胥和陳寶琛的關係本來就很密切，當然陳對鄭的意見也表贊同。後來，陳和莊士

敦幫同鄭、金使溥儀離開北府起了很大作用。

老謀深算的羅振玉，卻與鄭、金的作風完全不同，我沒有看見過他和溥儀進行秘密談話。有時他也到大書房，和王公們談些他怎樣和段祺瑞以及其他方面交涉的情況，對溥儀早日離開北府的話，是隻字不談。其實，他不但在背後與鄭、金互相勾結策劃一切陰謀活動，並且和日本使館方面早已取得聯繫，直到溥儀到了日本使館以後，他的猙獰面目和陰謀計劃才暴露出來。

一陣怪風陷身魔窟

二十四日以後，由於段祺瑞、張作霖相繼到達北京，北府大書房內此往彼來，情況十分活躍。王公這方，有我父親和載澤分別與段、張會談，商議各項急待解決的問題。他們回來後，總是喜形於色。有一次他對大家說，段、張對馮玉祥所修正的清室優待條件也不同意，將來可能仍舊履行原來的優待條件，他們正在研究中。遺老舊臣們也是紛紛向段、張接洽，答覆也大致相同。在大書房多日未曾出現的金梁，也得意洋洋地來向大家說，他和張雨亭有很深的關係，他已經和張商妥，仍然原來條件辦理，想段方也無何問題。當時大家對前途非常樂觀。

從二十五日起，駐守北府的馮軍全部撤走，只由幾名警察擔任守衛，出入無阻，已回復了常態。這時，北府之中，無不歡天喜地、額首稱慶。就連多日以來愁眉不展的我五伯，也是面帶喜色。這時，在大書房又聚集了不少遺老舊臣和王公們，開始商討起溥儀的將來許多問題。抱極端

樂觀主義者說，既是能夠履行原來的優待條件，就是恢復十一月五日前的狀況，請溥儀還宮恢復帝號，有的主張應該退居頤和園。也還有人說，在北京市內買一所房居住，免得再蹈這次的覆轍。議論紛紛，莫衷一是。最後，還是毫無結果而散。這時，來的王公比先前也多了。我父親和載澤就想了一個「久安長治」的辦法，由他二人各率幾名王公，輪流在北府值宿，認為一切問題既告解決，勿論鄭、金進行任何活動，也不會發生其他意外之事。其實，王公們對溥儀的情況一點也不了解，就像蒙在鼓裡一樣。

溥儀出宮前後

二十六日傍晚，我和溥儀正在「樹滋堂」閑談，忽然有人進來說鄭孝胥陪同大夫來了。我當時感到非常驚奇，知道溥儀並沒有生病。此時，鄭和他的兒子鄭垂陪同兩個身著西裝呢帽戴到眉上的人進來，與溥儀一同到內室去了。我因一時好奇，在室外偷聽了半天，由於他們談話聲音很低，什麼也沒有聽到。時間並不太久，仍由鄭氏父子陪同這兩人匆匆告辭而去。這次會見是否與溥儀預先約定，我始終不得而知。飯後無人時，溥儀才對我說：「剛才來的是日本使館武官（或許是參贊，已記不清楚）和一個翻譯，他們對我住在北府也感到很不安全，最好是先到東交民巷，他們一定幫忙再給我找一個安全地方居住。」溥儀還說：「我也考慮過，段、張的話也不能使人完全相信，一旦再有變化，再想走也走不成了。我打算在這兩三天內，先到東交民巷。你們暫時還留在北府，等我有了一定的住處時，你們再找我去。」最後，他還再三叮囑說：「這件事非

常重要，在我未走之前，千萬別對王爺（指我五伯）和你阿瑪說。如果洩漏出去，不但我走不了，生命還有危險。」我從來對溥儀所囑咐的話總是奉命唯謹。因為從我幼小的時候，就被那種封建禮教所滲透，在思想之中就知道「君父之命」必須無條件地去遵守。到了宮內之後，也聽溥儀對我說過，宮裡的事情不能隨便到外面去說，而且我和溥儀感情素篤，尤其是我對於溥儀、莊士敦所說的不能久居北府的意見，認為是非常正確。對於我父親和其他王公所主張的在北府聽候解決的意見，認為是保守。這樣，對我父親尚且守口如瓶，其他王公更是毫無所知了。

當晚，溥儀和我，還有兩三名外隨侍，就把從宮內所帶出來的珠寶等整理在一個手提箱內，準備溥儀走時攜帶方便。溥儀忽然想起他最為珍視的一顆珍珠「頂珠」沒有裝在箱內。他說是放在臥室床頭櫃的抽屜內，及至我們取時，這顆頂珠竟然不翼而飛了。事情是這樣：十日派人到宮內取東西時，有外隨侍嚴桐江，趁衆人不注意的時候，偷偷地把這顆頂珠從朝冠上取下藏在懷內。到了北府之後，我親眼看見嚴桐江把它交溥儀之手。這顆頂珠很大，長約有市寸二寸左右，其形彷彿橄欖核，色澤瑩潤非常，從來我沒有見過那樣大那樣的珍珠。據說是從康熙時代傳留下來（當初恭王溥偉對我談過這顆頂珠的歷史甚詳。我已忘記了），歷代皇帝對此珠非常重視，在大典（如元旦受賀）穿朝服（與一般袍褂樣式不同）的時候，朝冠上那顆頂珠就是此珠。平時是不戴用的。北京旗人口中很早就流傳著這樣一句

話：「你別看我戴的白頂子，連皇上還帶白頂子呢。」清朝白頂子的品級很低，有人輕視時，就愛這樣說，意思是指此珠而言。可見這顆頂珠確有相當長的歷史。我們找到深夜，依然是杳如黃鶴。嚴桐江就說，他在宮裡聽老太監們說過，這顆頂珠是顆寶珠，很早以前，每當皇帝有了災難的時候，例如庚子年八國聯軍進北京，以及辛亥皇帝退位，這顆頂珠都會不見了。等到災難時期過去，皇帝再戴用的時候，它自己又回來了。我在宮內時，也聽太監說過這樣的話。當時我們迷信很深，認為這顆奇異的寶珠「它又走了」，不禁有些黯然神傷。

次晚，溥儀對這顆頂珠還是念念不忘。我們又開始尋找起來，「樹滋堂」內真是翻箱倒櫃重尋了一遍，結果，把這顆所謂能夠來去自如的奇異寶珠在一只裝衣服의皮箱內找到了。當時，真是如獲至寶，欣喜非常。其實並不是這顆頂珠會不翼而飛，原是溥儀平素有些馬馬虎虎，對任何物件到處隨便亂置的緣故。在宮內像這種迷信傳說，真是不勝枚舉。為的就是把皇帝說成是「天神」一般，天下的奇珍異寶都是為皇帝一個人來享用的。這就是歷來封建統治階級所常玩弄的一套鬼把戲，用來以迷惑人民。在偽滿時期，每逢陽曆元旦，我還看見溥儀偷偷地穿上朝服，戴上這顆頂朝冠，在祖宗牌位前行叩首禮。現在這顆寶珠一定回到人民手中來了。

二十九日正午稍過，正當狂風怒吼、塵沙蔽日的時候，陳寶琛、莊士敦和鄭孝胥一同來到北府。他們低聲地和溥儀密議了片刻，就吩咐把溥

儀的汽車開到阿斯門外。溥儀臨行對我們說：「我現在就到東交民巷，住處還沒找好，皇后和淑妃先不要去，等我找好了住處之後，再派人接她們來。你們以後再找我去罷。」說罷，由陳、莊、鄭三人把溥儀圍在中間，匆匆離開北府登車而去。

溥儀走了很久之後，消息才傳到我祖母那裡，她當時就把我叫了去。我從來還沒見過我祖母那樣嚴厲的態度，她問我：「你整天和皇帝（我祖母向來稱溥儀為皇帝）在一起，為什麼事先也不和我說一聲，也好叫他把皇后、淑妃一起帶走呀！」我五伯和我父親也追問我，究竟到什麼地方去了？

這時，溥儀的妻子也流著眼淚向我追問。我當時感到十分尷尬，只好欺騙我祖母他們說：「事先我真是不知道。臨走時，說到東交民巷，究竟住在那裡我也弄不清楚。」我趁大家議論中間，就悄悄地溜出去了。

傍晚，給溥儀開車的（姓黃，原來給我五伯開車）回來說，他把溥儀送到東交民巷德國醫院（即今北京醫院）之後，等鄭孝胥和莊士敦出去接洽了許久，後來就把溥儀送到日本使館裡邊去了。他還說：「在途中還有一輛坐有軍人的汽車追趕他們，直到溥儀的車開進東交民巷才不見了。」據黃所云如此，不知確否。

溥儀被這陣狂風送入了魔窟——日本使館以後，完全被這群惡魔所迷惑，並且是愈迷惑愈深，直到後來，就連個人的命運也任憑日本帝國主義、陰謀復辟分子們隨意擺布。

日本使館群魔火拼

十二月三日下午，我初次到日本使館去見溥儀。他住的是一座二層樓房。據說，這裡原是芳澤（日本駐華大使）住的，臨時遷出，讓給溥儀居住。有幾名改穿便服的護軍在那裡擔任傳達和一切勤雜事務。我告訴他們要見溥儀。有一個護軍（原任隊長，姓名已記不清楚）和我很熟，低聲地告訴我：「這裡可跟北府不一樣了，什麼事都必須先和鄭孝胥、羅振玉說一聲，不然他們要申斥我們。」我聽了之後，感到十分不快，可是到了日本使館又有了什麼辦法呢。我到樓上見了溥儀，他臉上帶著不愉快的樣子說：「我來到日本使館以後，感覺很不方便，就連院子走走都不隨便。每天鄭孝胥、羅振玉他們總是為了爭優待條件在我這裡吵個不休，實在煩悶極了。以後你還是常到這裡來，我們好隨便閑談一談。」我說：「到日本使館來很不方便，等過幾天再來的相當厲害，我就不想再去了。」

大概是在八日或九日，溥儀又找到日本使館去。自然要先和鄭、羅說一下。我記得那天還有三、四個王公和幾個遺老一起要見溥儀，羅振玉就正言厲色地向我們說：「這裡不同在北府，每天來的人太多，對於使館治安上很不相宜。我已和使館方面商妥，今後有事要來的就在星期三、五兩日；其他的日子要來，就必須經過使館方面許可才能進來。」眾人聽了都悄然散去。我到樓上，溥儀一見面就和我說：「這幾天實在把人住膩了，可是北府也不能再回去了，我一定要想辦法離開這裡。」他還說：「這兩天羅振玉、鄭孝胥和金梁他們爭吵的很厲害，前兩天他們大聲嚷嚷，連我在樓上都聽見了。」溥儀還叫我時常到這裡來，我就把羅方才說的話向他說了。他完全不知道有這事。我們相對愀然。在無可奈何中我辭去。這就是在溥儀離北京前我們最後的一次談話。

我到樓下，那個護軍對於這幾天的經過十分了解，他就向我作了介紹（其中也有事後我所知道的一些情況）。情況大致是這樣：自從溥儀到了日本使館以後，鄭、羅之間無日不在爭吵。因為溥儀住在日本使館，是由鄭所接洽，鄭自然要獨攬大權，凡事都由他與日本使館來聯繫。不料從中又出來一個久居大連、被日本帝國主義豢養多年的羅振玉，當然要比鄭受到日本使館的重視和信任。因此，使館方面有事聯繫時，總是找羅而不理鄭，鄭自然是不服氣。最初，鄭、羅之間在表面上只是借著爭論優待條件的意見不同為名互相爭吵，到了六日、七日，就成為對溥儀居住日本使館這件事互相爭起功來。最後，二人是拍案大罵，聲達戶外。但羅已胸有成竹，他知道鄭背後有陳寶琛給他撐腰，因此他來到日本使館後，就電召升允來京。（辛亥革命前，升允任陝甘總督，辛亥革命後即逃往日本，在東京曾開設一座飯館，取名「陶陶亭」，名為謀生，暗中勾結日本軍人、政客和浪人之流，積極進行復辟陰謀活動，我在日本讀書時，略聞其事。）升允在當時，不僅在遺老舊臣中頗負聲望，並且他和溥儀

有翁婿關係，所以和王公們也比較接近。升允到日本使館見了溥儀之後，不僅在優待條件上完全按照羅的意見辦理，特別是日本使館方面，對羅更加垂青。鄭知道不能與羅爭鋒，就一怒而去天津。「火併」這一幕，就由羅取得一時的勝利而告結束。

真假遺老難於辨別

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四日是陰曆元旦。這一天，日本使館准許人到使館與溥儀拜年。我跟隨我父親到了使館，約有四、五十人，除王公四、五人外，餘者盡是遺老。我們都到樓上一間大廳裡排班站立。溥儀出來之後，眾人齊向他行三跪九叩的「君臣大禮」。正當舉行「朝賀」最嚴肅的時刻，在朝班中只聽「嘩」的一聲怪叫，立刻打破了這嚴肅的氣氛，秩序陷於混亂狀態。眾人趨前一看，見金梁匍匐在地，號啕痛哭。當由幾名護軍將金梁抬下樓去。這一場風波過後，眾人也未待禮成，就紛紛狼狽下樓而去。當時，議論紛紛。迷信家說，在這樣隆重大典號哭，是「不祥之兆」。也有人說金梁是沽名釣譽，當眾顯示忠貞。還有人說金梁見鄭孝胥一走，他當然有兔死狐悲之感。我認為最後的這一評論，雖然帶些諷刺性，但還確切。

溥儀出宮後

二月五日，我跟隨我父親又到日本使館祝賀溥儀的生辰（在宮廷也是大典之一，稱為「萬壽」）。這次倒是在風平浪靜的情況下行禮如儀後而退的。我兩次來祝賀，並沒有和溥儀單獨見面。我知道他平素非常膽小，自從聽了羅振玉那番

話以後，再不敢找我到日本使館去了。因此，在溥儀離北京前，我們再未見面。

我在最後這一次到日本使館，有兩件值得記述的事。首先是：參加祝賀的人群中，王公來的簡直是寥若晨星，而遺老方面則是成群結隊。大概由於遺老之間互相援引的關係，有不少都是從來所未見的人，真假遺老，實難辨別。甚至還有三、四十歲的人也參加在遺老行列之內。據說這裡邊有遺老之子和冒充遺老的。有人稱這些人爲「遺少」，也頗耐人尋味。自溥儀出宮以後，由於不受宮廷的限制，這種難分真假的遺老人數，確是方興未艾。其中也出現了不少陰謀復辟的分子。其次是：在溥儀左右，除了獐獍跋扈的羅振玉和肩負詔笑的佟濟煦外，又增加了一個胡嗣瑗。聽說他是張辦帥（張勳）的入幕之賓，由萬樞棧引荐而來的。張勳復辟時，胡曾在幕後爲張籌劃一切，後來論功行賞時還做了兩天內閣閣丞。胡爲人外似剛直，內頗陰險，自他來到日本使館以後，頗得溥儀的信任，大有言聽計從、如魚得水之概。他在鄭、羅之間，總是看風駛舵、朝秦暮楚。鄭、羅「火併」的一幕，羅能取得暫時的勝利，胡從中也出力不少。從此以後，胡不但極力排斥王公，就連陳寶琛和不順從他意旨的遺老們也在排斥之列。特別是溥儀的行動，多爲胡所左右。真是魔窟之中又多一巨魔。

化裝日僑逃往天津

隔了兩天，我到莊士敦家中，他一見面就十分氣憤地對我說：「我被鄭孝胥所欺騙了。」情

況大致是這樣：莊士敦對鄭與日本使館早有聯繫一層，他事先毫無所知，他本想與鄭合作把溥儀接入東交民巷德國醫院之後，由莊士敦向英國或荷蘭使館聯繫住處和其他一切善後辦法。那知在莊士敦聯繫好了以後，溥儀已由鄭接到日本使館去了。最後，莊士敦對我說：「他（指溥儀）到了日本人手中，恐怕不會再放他出來了。」莊士敦這一句話卻有些「先見之明」。他見事情已無法挽回，同時又失去了「高官厚祿」，爲期不久便把汽車傢俱等變賣之後，就悄然返回英國去了。

大概在二十四日，在日本使館的那個護軍來見我父親，說是溥儀在二十三日夜，利用日本軍隊瓜代的機會，化裝稱爲日僑逃往天津去了。我父親聽了之後，很不痛快地對我說：「已然被遺老們所包圍，到了現在又有什麼辦法呢！」也只有好徒喚奈何而已。

寫到此處，我的這篇敘述暫且告一段落。

敬告留學生家長

慰藉 貴子女異鄉作客寂寞的最佳禮品，便是爲他們訂份「中外雜誌」。請將 貴子女在國外詳細地址填妥，連同全年訂費新台幣壹仟肆佰伍拾元，交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，寫明收件人姓名，本社立即按址按期寄書。